

外国语言文学高被引学术丛书

王宁◎著

后现代主义之后

(第二版)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外国语言文学高被引学术丛书

王宁◎著

后现代主义之后

（第二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主义之后 / 王宁著. —2版.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446-5691-7

I. ①后… II. ①王… III. ①后现代主义—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4070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王叶涵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5 字数 248千字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5691-7 / I

定 价: 4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质量服务热线: 4008-213-263 电子邮箱: editorial@sflep.com

出版说明

“外国语言文学高被引学术丛书”是基于“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Chinese Book Citation Index, 简称 CBKCI) 数据库的入选书目, 将入库的引用频次较高的外语研究学术专著, 进行出版或者修订再版。

该数据库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共同开发, 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 11 个学科, 以引用量为依据, 遴选学术精品, 客观地、科学地反映出优秀学术专著和出版机构的影响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 32 种图书入选“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数据库, 占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类入选专著数量近 1/4(共 132 种入选), 数量居该领域全国出版社首位。

本着“推广学术精品, 推动学科建设”的宗旨, 外教社整理再版这些高被引图书, 将这些高质量、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方式展现给读者, 这对于促进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 提高研究效率和研究质量, 记录与传承我国学者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为广大语言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源。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9 月

第二版序

本书是根据我在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论研究”之后对当代西方文化理论思潮进行考察研究而写成的。1998年中国文学版中主要收集了我写于1997-1998年的一些论文,并进行了编辑加工,形成一部比较有体系的专著。此次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邀请,再版之前又加了两章,并且对原来的章节作了一些修订。正如我在原来的“序”中所说,我本来的打算是回答国内学术界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即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文论还有什么值得研究的?确实,后现代主义在经历了风靡北美到欧洲乃至全世界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后,终于日趋衰落,原先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一些非主流话语力量,诸如女权/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后殖民主义与第三世界批评以及二十多年来兴起的文化研究是如何伺机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并在实际上消解了帝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中国读者也许还记得,我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曾陆续写下不少关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的一些文字,同时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和理论批评界引起过讨论和争鸣。因此,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我的名字也就自然而然地被人们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相联系了。我本人当时曾多次发誓再也不写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了,但却总是推托不掉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编辑们的再三命题约稿。后来有人向我建议,要想告别后现代,最好的办法就是写出一本全面介绍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理论与思潮的书。但是说这话容易,果真干起来就得先读上好多本书才能下笔。于是我就利用十多年来每次出国开会和研究讲学的机会,大量购置了这方面的书籍资料和学术期刊,再加上一些外国朋友赠送的,总共也有几百种了。由此,我一边读书,一边写作,然后将写成的单篇论文寄给一些催稿最急的杂志社先行发表。这样,不知不觉地两年之内,我已在国内外发表了几十篇关于这方面论题的文章,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我挑选出十几篇重新编排改写成本书的第一版。

目前这个版本,按内容和体例分为四编。第一编的文章分别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做出总结性的评述,并对后现代主义争鸣衰落之后西方文化学术界出现的新格局做出概

括。当然,这样的概括难免挂一漏万,但至少能给一般读者一些新鲜感,同时也为学界同行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编“后殖民主义”应当说是本书的重点,在首先对后殖民理论的源起以及后殖民地文学的概况做一“鸟瞰式”的评介后,我便根据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这三位公认的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的理论特点予以较为详细的评析,并联系近十多年来中国文学界、电影界和文化界所关心的“后殖民性”以及“非殖民化”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介入第三世界语境下关于后殖民主义的讨论。这一编的第七章初版时未来得及收入本书,此次修订时将其补上,也算是完成了对后殖民理论“三剑客”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介和讨论。第三编可以说并非我研究所长,因此初版时只有两章,分别论述了西方和中国的女性文学和女权主义理论。坦率地说,我过去的研究(特别是在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性时)往往忽视了二十多年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崛起,因而引起一些妇女界朋友们的不满甚至批评。我想本书初版的这两章至少证明我本人对当今的文化研究语境下女权/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关注和重视,当然其挂一漏万之处还有待她们的批评指正。此次再版时增加了第十章,总算将后现代主义之后女权/女性主义理论向性别研究过渡的一些新动向作了总结性的研究。第四编所论述的文化研究目前正在西方(尤其是英语文学界和文化界)风行,许多问题由于离当下太近而仍在讨论之中;而且对“文化研究”的定义也远未达成相对的共识,因此我也只能一般概述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将其运用,至于其成败得失,我想自有读者去评说。

总之,由于我本人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比较文学和西方文学与文论,即使偶然涉猎中国文学,所采用的视角也是比较的和跨文化的,尤其是中西方之间的比较,因此这本书基本上反映了我一贯的著述风格:超越学科的界限,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立足于比较文学研究,立足于将西方的理论改造后运用于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最后达到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目的。当然这只是我本人的愿望,至于是否已经做到这一点,还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本书如有论述不当之处,恳请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吝匡正。

王 宁

2018年8月

修改于上海

目 录

第二版序	I
------------	---

第一编 超越后现代主义

第一章 后现代性与全球化	3
第二章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与思潮	14

第二编 后殖民主义

第三章 后殖民理论与文学	61
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	73
第五章 赛义德：东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	88
第六章 斯皮瓦克：后殖民地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批评	104
第七章 巴巴：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	118
第八章 中国当代电影的后殖民性	130

第三编 女权主义理论与文学

第九章 女权主义理论的新走向	143
第十章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性别研究和怪异研究	151
第十一章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先锋意识	162

第四编 文化研究

第十二章 文化研究：今日西方学术的主流	175
第十三章 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	189
第十四章 文化研究与经典文学研究	197
第十五章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后现代性	206
第十六章 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分裂特征分析	217

第二版后记	228
-------------	-----

第一编

超越后现代主义

第一章

后现代性与全球化

经过三十多年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辩论,东西方学者大概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后现代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后工业社会,但它并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品,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及东西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证明,后现代主义有可能在某些局部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并以变体的形式出现。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文化交流和文化接受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某一东方或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因此,连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①和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②这样的曾一度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可能出现在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学者也改变了原先的片面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或一场国际性的文学思潮和运动,它并非只能出现在先行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过去的研究,我在此首先对后现代主义及其研究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做出新的描述,以便对当今普遍为人们所谈论的文化全球化以及其与本土化的冲突和共存进行基于东方视角的剖析。

从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性

正如美国学者、国际后现代研究理论刊物《疆界2》(*boundary 2*)主编

① 在1996年12月7日的一次公开演讲(澳大利亚佩斯)中,詹姆逊显然改变了自己过去的观点,他认为,“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今天描述这一现象,应当用‘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而非‘后现代主义’,因为在我看来,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之后我们多次在私下交谈中,他承认自己从日本、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辩论中得到一些启示。

② 佛克马自1990年以来便承认,后现代主义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也并非西方所独有,它可以以某种变体的形式在一些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和文学中产生变体。参见 Hans Bertens and Douwe Fokkema, eds.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保尔·鲍维(Paul Bové)所总结的,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有待学者们去编写,^①但大家都公认,这场运动始自建筑领域,并迅速波及文化界和文学界,“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权威性著述中达到高峰,这样批评家们便将这一建筑学界的用法发展成为广泛复杂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晚期资本’的‘逻辑’的叙述。”^②按照鲍维的看法,“詹姆逊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诸多思潮流派的仔细的辨析,从而将这些流派与后现代主义内部的各种意识形态观念和立场相联系。”^③显然,詹姆逊的研究之所以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仅是因为他所站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之高度,同时也在于他在承认参加后现代主义论争的各种思潮流派的合理性之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独特描述和分析,从而迅速地把一场原先仅限于美国的文化和文学批评界的讨论上升到文化批判的高度,并与在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层面进行辩论的欧洲大陆的关于后现代问题的论争相契合。

正是受到这一方法的启迪,我在本章中首先在自己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做出新的描述和概括:(1)后现代主义首先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但它也可能以变体的形式出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既有着西方的影响,同时也有着具有先锋超前意识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接受和转化;(2)后现代主义在某些方面也表现为一种世界观和生活观,在信奉后现代主义的人们看来,世界早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呈现出了多元价值取向,并显示出断片和非中心的特色,因而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是统一的,其价值观念也无法与现代时期的整体性同日而语;(3)在文学艺术领域,后现代主义曾是现代主义思潮和运动衰落后西方文学艺术的主流,但是它在很多方面与现代主义既有着某种相对的连续性,同时又有着绝对的断裂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极致:先锋派的激进实验及智力反叛和通俗文学和文化的挑战;(4)此外,

① 关于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发展演变历史以及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的来龙去脉,参阅荷兰学者,Hans Bertens. *The Idea of the Postmodern: A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② Paul Bové, ed. *Early Postmodernism: Foundational Essay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1998年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是我率先在中国介绍这些理论,因此除注明了中国版本外,其余都为我自己翻译。

③ Ibid.

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叙事风格或话语,其特征是对“宏大的叙事”或“元叙事”的怀疑或对某种无选择或类似无选择技法的崇尚,后现代文本呈现出某种“精神分裂式”(schizophrenic)的结构特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断片式叙述中被消解了;(5)作为一种阐释代码和阅读策略的后现代性并不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限制,它不仅可用来阐释分析西方文学文本,而且也可以用于第三世界的非西方文学文本的阐释;(6)作为与当今的后工业和消费社会的启蒙尝试相对立的一种哲学观念,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同时扮演了有着表现的合法性危机之特征的后启蒙之角色;(7)后现代主义同时也是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批评家用以反对文化殖民主义和语言霸权主义、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的一种文化策略,它在某些方面与有着鲜明的对抗性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和策略相契合;(8)作为结构主义衰落后的一种批评风尚,后现代主义表现为具有德里达(Derridian)和福柯(Foucauldian)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色彩的批评话语,它在当前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我对以往的研究有所超越后得出的新的定义。

毫无疑问,从有着强烈西方中心色彩的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演化为有着更广泛的全球意义的后现代性这个概念,不仅取决于西方学术界内部的解构和消解中心等尝试,在更大的程度上也取决于广大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弘扬本民族文化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此外,经济的迅猛发展,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的作用,计算机对知识的储存和转化等程序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全球化的到来。正如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多年前就已经指出的,“假如这就是这种情形的话,那么交往的透明性便与自由放任主义类似了。自由主义并不排除某个资金流动的机构,因为在这个机构内一些途径也可用来做出决定,而另一些途径则仅适用于债务的支付。人们同样可以想象出知识沿着同一性质的同一途径旅行的那种流动,其中一些被保留下来供‘决策者’使用,而另一些则用来偿付与社会契约有关的每个人的永久的债务。”^①显然,后现代社会的知识状况就是这样为文化知识成为消费品而奠定基础的。下面我将论述消费文化在后现代社会的作用以及对传统观念的挑战。

①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 6.

作为消费文化的后现代性

关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化界和文学界的出现和演变历史,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长达三十多年的辩论,及其在中国社会产生的种种影响及变体,我已经在许多场合做过较多的论述,^①因此本章不再予以重复。我这里想再次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和艺术上的反映往往表现出两个极致: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对经典现代主义的延续和超越)和导向通俗(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对精英意识的批判),对于前者我已在不少场合做过论述,本章仅集中探讨后者,因为十多年来,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各领域里发生的变化,作为一种全球现象的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文化的关系已变得越来越密切。当然,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在后工业社会的直接后果——消费文化的批判,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任务。对于这一点,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曾一度只看到后现代主义与先锋派的共通之处而忽视了其与当代消费社会以及后果消费文化的更为密切的关系。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詹姆逊就从后现代消费文化入手开始了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在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的演讲中,他指出,除了考察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外,人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停下来思考,通过对近期的社会生活各阶段的考察对之做出描述……在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被人们从各种角度描述为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传媒社会等)。新的人为的商品废弃;流行时尚变化的节奏愈益加快;广告、电视和传媒的渗透在整个社会达到迄今为止空前的程度;城郊和普遍的标准代替了原有的城乡之间以及中心与外省之间的差别;高速公路网的迅速扩大以及汽车文化的到来——这一切都只是标志着与旧的战前社会的彻底决裂,因为在那时的社会,高级现代

① 关于我本人以往对后现代主义之界定的描述,参阅拙作,接受与变形: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的后现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第139-140页;“Constructing Postmodernism: The Chinese Case and Its Different Versions.”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20. Nos.1/2, 1993, p. 50.

主义仍是一股潜在的力量。”^①毫无疑问,消费文化在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文学艺术研究者那里曾一度不被问津,因为它首先是指当前流行的东西,其价值并未受到历史的检验,因而不能与经典文艺作品同日而语;其次是它属于通俗文化的范畴,而通俗的东西往往鱼龙混杂,一向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它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文化研究者的理论分析之外;再者,消费文化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美学”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价值。总之,消费文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曾受到不屑一顾的“礼遇”。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一大批严肃的第一流学者和文化批评家开始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当代消费文化,并从文化批判的高度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加以分析,从而使其逐步受到重视并成为当今文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法国的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十多年前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指出,“模拟正是这种无法抗拒的现象,也即事物的这种序列,似乎这些东西也有意义,因为它们只是受制于人为的组合和无意义性。通过激进的假信息来给那一事件的拍卖标价。为这一事件定价,作为将其当作儿戏和当作历史的一种对立面。”^②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一切都是这样具有价值,同时,一切又这样不具有任何价值,意义可以任意通过人们的解释而被建构出来,同时建构出来的意义同样又可以被消解。这也许就是后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取向所使然。

现在来看看中国当代社会的情形。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就逐步进入了市场经济运作的轨道,这种运作机制不可能不对我们的文化艺术研究有所影响。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消费文化也开始逐步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文化的制作性、商品性和消费性破坏了它固有的高雅性和神圣性,对文化的重新定义已在不少学者的论著中出现,但中国理论界对当代消费文化的关注与其在西方理论界颇受重视的“礼遇”仍形成强烈的反差。曾几何时,消费文化和文学就在西方引起了主流文化理论家或批评家以及学者们的注意,从而成为当今的文化

① Hal Foster, ed.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Port Townsend, Washington: Bay Press, 1983, pp. 124-125.

② Jean Baudrillard. *The Illusion of the End*. Trans. Chris Turn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4.

研究者的一大理论课题。

其实,探讨和研究消费文化即使在西方也并非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事,早在 60 年代,美国文化界和理论批评界兴起的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不少论者涉及了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当时颇为风行的一个口号就是后现代主义批评家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一篇文章的标题“越过边界——填平鸿沟”,这也是费德勒式的后现代主义,它在那众声喧哗的年代里倒是颇有一些影响。针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天然界限,费德勒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该是结束装腔作势的时候了;因为填平鸿沟也即越过惊人的(marvelous)和可能的(probable)之间、真实的(real)和虚构的(mythical)之间、闺房和财会室之间,以及……的界限”,^①费德勒这里显然指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极致:与当代大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的合流,他的研究实际上预示了多年之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大潮在美国的兴起。照他看来,后现代主义不同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越过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人为界限,填平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天然鸿沟。传统的充满精英意识的现代主义文化之所以在当代受到严峻的挑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与广大读者观众(文化艺术的消费者)格格不入,最后终究难以摆脱陷入绝境之厄运。而后现代主义则以较为灵活的策略试图在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评判艺术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艺术精品的存在受到了消费者的挑战,出现了高科技操作下的复制的艺术,甚至拼凑的艺术,无深度、平面化、增殖、拼贴、碎片等均成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到了 80 年代初,詹姆逊尝试着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关系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他指出,后工业社会消费文化的崛起致使高雅文化和经典文学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在后工业时代,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高级精神产品的文化和艺术也被当成了消费品:无限制的重复、模拟、增殖,甚至大批量的生产和制作代替了现代主义时代对艺术这一高级精神文化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代替了达到心理现实之深度的充满忧郁感的人物分析,破碎的甚至精神分裂式的艺术结构代替了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心理分析式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

^① Leslie Fiedler. *Cross the Border — Closethe Gap*.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2, p. 80.

sis)为精神分裂式的分析(schizoanalysis)所替代。这一切出现在当今社会的文化现象均引起了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批评家的关注,但他们关注的方式并非仅仅简单地喊几声“拯救人文精神”或哀叹“人文精神的危机”,或干脆对之不屑一顾;而是直面这些复杂的现象,以文化批评的锐利触角对之进行剖析,同时也以理论的阐释力量对之进行阐释,从而透过这一无法回避的当代现象来提出一系列问题并提供自己的思考对策。我以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其结果并未进一步加剧两种文化的对立,倒是促成了双方的共融和一种多元共生之格局的形成。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语境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各种文化形态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活动的空间,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either/or),而是同时共存(both/and)和互补(complementing each other),我以为这对我们分析中国当代的种种文化现象也不无启发。

在当前的中国文化界,一些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人文学者和批评家对十多年来消费文化及其艺术作品的风行,以及其对精英文化构成的挑战忧心忡忡。他们试图通过“拯救人文精神的危机”之举来对抗消费文化的挑战,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样做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有可能加剧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业已存在的对立,而在一个市场经济逐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这种对立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精英文化和高雅艺术的消亡。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消费文化在当代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无时无刻不像一个隐形的上帝那样主宰着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如果对其作用把握得当,它可能有助于高雅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反之则一步步地“蚕食”目前日渐萎缩的文化市场,最后一举占领。对此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转型时期,原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从而促成了当代文化的多元共生、互融互补之格局;对文化本身之价值的理论探讨依然在学术界和文化机构内深入进行,并朝着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化理论方向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的扩大使得中外学术交流和东西方文化的对话成为可能,在未来的世纪里,古老的东方文化将一甩历史的重负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多元共生的文化新格局中;文化精品的生产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方式运作,但往日所具有的那种先锋性和精英意识却愈加暗淡,读者大众的兴趣日益转向别处;消费文化

异军突起,在市场经济的有利条件下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并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化和人文教育,致使一些仍抱有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的文化人大声疾呼“拯救人文精神”;一些出版社也采用消费文化的包装手法推出文学精品,但仍然收效甚微。对之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呢?这无疑是我们当代文化批评者所必须正视的问题。

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对立与对话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下,打上了种种“后现代”或“准后现代”印记的中国当代消费文化也呈现出各种形态:各种小报的周末版和副刊成了某种一次性消费的“文化快餐”;有着更多观众的电视艺术对需要更大经济和艺术投入的电影形成了有力的挑战,致使中国电影受到来自好莱坞(西方文化)和本土(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的双重挑战;在欧美根本难以觅见甚至在日本也早已不那么时髦的卡拉 OK 歌厅冲击着高雅的欧洲古典音乐和艺术歌曲的领地;话语权力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运作制约着图书市场的生存和发展,书商的崛起更是强有力地冲击了本来就日益萎缩的图书市场;高科技的发展以及后工业时代复制技术的发达甚至使以 MTV 的形式来塑造歌星和影星成为可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确实,文化生产者在创造文化艺术产品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并认真考虑“消费者”(读者和观众)的因素以及市场运作机制的重要性,这较之过去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毕竟文化产品的生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消费品的生产,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价值并不能以市场的接受程度和生产数量为衡量标准。因此这就需要对以往的文化理论进行调整和完善,使之也能用于解释消费文化这一后工业社会中带有“后现代”印记的独特现象。

从北美到欧洲,进而扩展到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这一本来局限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现象终于演变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它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的全球化现象。正如詹姆逊在谈到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情形时所指出的,除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和中国学者的自觉介绍和创造性接受外,后现代性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蔓延还取决于另外三个因素,这就是(跨国)资金的运作,全球性的资本化,以及(计